

# 中国社会学十年概观

王 育 民

中断27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从1979年3月开始重建，到现在，已经走过十年的路程。这十年正值我党的战略重点转移，我国社会迎来历史上少见的大改革、大变动、大发展的新时期。因此，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必然反映这一时代特点。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需要社会学，新中国的社会学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如今，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已从初创阶段进入巩固、发展阶段，教研队伍日益扩大，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为在世界社会学之林中独树一帜，我国社会学正在迈着坚实的步伐，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

## 重温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老社会学家曾经积极努力想使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研究我国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可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所以在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撤消了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课程。1956年，一些学者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重新提出社会学问题。1957年2月20日《文汇报》刊载了费孝通同志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对于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如恋爱、婚姻、家庭、节制生育、民族问题等，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社会学似乎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57年，社会学又一次遭到围剿，被当作异端邪说，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大禁区。于是，社会学再次从学术领域中消失。

解放后，各大学社会学系不再招生。做出这一决定的理论根据是，既然学校设有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就不必要再设社会学这门学科了。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对社会学起指导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溶解和取代社会学。

解放后大学里停止教授社会学的另一个根据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旧中国的社会胚胎中诞生的。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个长期的艰难的历史过程，存在着主客观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老的社会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由有矛盾、有问题的社会变成了无矛盾、无问题的社会，任何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矛盾，都存在着社会问题，都应该科学地对待。掩盖矛盾，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极为有害的。

所谓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关系或环境失调，致使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至社会进步发生障碍，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很多是由失调引起的，如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农林牧副渔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等。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失调，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有些社会问题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缺乏认识引起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处理不当，重生产轻消费，重工业轻服务，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比例失调，造成大批为人民生活服务所需要的事业无人去干。

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由于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关系的各个环节不能不受到落后生产力的制约。为了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要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内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商品交换所蕴含着的一些固有弊端还会长期存在，成为影响人们正常社会关系的不利因素。一些人会在商品交换中投机倒把，倒买倒卖，侵占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拜金主义”还会有相当大的市场，成为一些人处理自己与他人、集体、国家关系的准则，由此导致种种不正之风和经济犯罪问题。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将导致人与人关系不协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十年浩劫我国社会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严酷现实，使人们逐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的社会学，需要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和理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需要补课，从此，重建社会学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并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

### 适应改革的需要 重建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可以满足社会上三个层次的需要。一是满足基层的需要。就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基本知识，充实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二是满足第二层次的需要，就是向负责社会管理的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提供所需的社会工作方面的基本知识。三是满足最高层次的需要，就是运用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的特点，对国家社会经济重要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咨询，为政府决策服务。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虽然中断近30年，但对我国社会进行科学探讨的工作并没有完全中断。可以说，在我国恢复社会学是有基础的。首先，我们党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其次，我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培养造就了一批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我国社会学赖以开展的主力军和骨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处于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从社会学角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方能妥善地加以解决。因此可以说改革促进了社会学的新生和发展。

1979年3月13日至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了有6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会上，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学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由50人组成的理事会，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会的成立，标志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会结合，开始了中国社会学会整体重建工作。首先抓了社会学师资和研究人员的培训，在一些重点大学建立社会

学系。1980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重建社会学后的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40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学习。第一期学员毕业以后，第二年夏季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讲习班（以后几年，分别在天津、武汉、上海举办了这种讲习班）。随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仅三年多的时间，就有上海、黑龙江、湖北、吉林、天津、北京等省市建立了社会学学会（或研究会）。许多省市也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复旦大学分校（现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许多院校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积极筹建社会学研究室。这些组织促进了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激发了各地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实地调查的积极性。

在广大科学工作者激起了研究热潮的时候，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重建中国社会学，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5月22日至26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了年会，会上着重讨论了社会学如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的研究，要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旧中国社会学，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并修改了会章。

就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头三年主要是搭架子，组织队伍，零零星星地搞了些调查。1983年4月1日至8日在成都召开了全国社会学“六·五”规划会议。这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次规划会议，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把社会学研究课题纳入国家规划。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会议确定了列入“六·五”规划的重点课题，这就是“江苏小城镇研究”、“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其发展道路——五城市家庭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

除此以外，各省、市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组织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涉及的领域有：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人口问题、劳动问题、社区研究、工业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这些研究项目勾绘出一幅全面建设的蓝图，为社会学学科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深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社会问题，1985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在南宁市联合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体制改革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和价值结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生活方式变化的关系等问题。1985年12月14日至17日，国家教委一司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社会学专业教改研讨会。会议分析了当前我国教育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回顾了社会学事业恢复和重建以来的情况，并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知识结构和培养途径、教材建设以及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系统等问题进行专门讨论。1986年4月26日，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经验，讨论“七·五”期间的工作设想和关于学会的学风、会风以及组织机构改革的问题。科研系统、教学系统和学会系统相继召开的这三次会议，客观上为“七·五”期间社会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1986年9月20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社会学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社会学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

“七·五”期间社会学科研工作设想，提出“七·五”全国社会学科研项目的建议。同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京召开，评议了各单位推荐的研究课题，最后以无计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七·五”期间社会学学科的首批13个国家重点课题，它们是：1.小城镇与城乡关系研究；2.农村家庭功能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3.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4.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和阶层结构研究；5.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6.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研究；7.中国现代社会结构模式研究；8.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价值观念变化和社会问题；9.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研究；10.“七·五”期间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1.我国城市老龄问题及对策研究；12.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13.香港社会研究。1987年10月30日至31日，国家社会科学社会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会议，评审了1987年社会学学科国家重点项目和使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确定使用社会学学科基金的项目有：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2.三城市发展比较研究；3.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4.四川农村婚姻现状及对策；5.蒙古族生活方式研究；6.西方学术思想与当代中国大学生；7.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人口心理；8.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随着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开展，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引起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35个省和大中城市成立了社会学学会，大多数省市都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研究室等专业机构。全国已有12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有将近50%的高校设立了社会学教研室，给文、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开设社会学理论课。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部门陆续建立了主管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研究的机构，把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如今中国社会学这支队伍中，拥有一千多名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其中有近200名正、副研究员或正、副教授），近千名在校的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还有近200名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198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室共同创办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目前已有两万名首届函授大学毕业生，分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遍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

1988年8月5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家教委社会学系、《光明日报》理论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社会学学会和中共伊春市委联合发起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在黑龙江伊春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除四川、安徽、河南、新疆、西藏、青海外）的196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和阶层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活方式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当前农村中的社会问题；社会学重建九年来的回顾与展望。会议期间，学会、研究所和教学系统还分别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对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时代特点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来，初步建成一支遍布全国的、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社会学科研和教学队伍；社会学研究逐步深入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理论探索、调查研究和普及社会学知识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社会学在社会研究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引起党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十年，是艰苦奋斗的十年，是辛

勤耕耘的十年，是开拓探索的十年，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闯出了路子，为社会学今后巩固发展打下了基础。纵观中国社会学十年的发展，具有以下时代特点。

### 1. 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弃旧创新，走自己的路。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地位，在大学里重新设立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中国的社会学和旧中国的社会学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不是恢复旧的而是创建新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立足于中国实际，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我们要在中国的泥土里生长出反映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对我们中国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在反映我国实际情况和特点，提炼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新的建树，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要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学。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有分析有鉴别地吸取西方社会学中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的东西。新的内容是通过旧有的东西改造、发展而来的，这里有个批判继承的过程，应当古为今用。我们应当立足于当前的中国的实际，吸收一切有利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养分，逐步发展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2. 坚持独立自主、全面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向。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一成立，就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学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全面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现代化科技革命条件下的特殊变迁，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社会、思想等在内的全面发展过程。我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虽然经过30多年的努力，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明显，我国的现代化具有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根本不同的特点。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符合我国社会特点的、独立自主的、以提高我国人民物质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全国人民造福。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特性。

### 3. 联系我国实际，把改革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广泛、深入、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变革。这次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改革一整套不适应生产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联系我国实际，就是要联系伟大变革的实际，对改革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社会学角度作出回答。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它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变动着的整体来研究其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间的联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研究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客体全然不同，而是对同一客观的研究角度不同。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的全面改革情况，吸收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探索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科技、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的途径，特别注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及社会问题。在深入的、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论述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科学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供决策部门参考。这就是社会学在这场改革中肩负的重要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学要着力研究的社会主义

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 4. 从我国国情出发, 大力加强社会调查研究。

要有效地进行四化建设和实行改革, 就必须认清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掌握国情。我国的基本国情, 一是人口众多, 是十亿人口的大国; 二是生产力水平低、底子薄; 三是资源供给能力制约较大。

社会学是以长于社会调查立足于世的科学。为了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更全面、正确地了解国情, 我们要整体地、综合地、系统地调查中国社会。社会学这门学科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开展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 以便为扫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障碍, 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提供依据, 同时也在实践中创立我国科学的社会学理论。

### 任重道远

回顾十年走过的道路, 成绩喜人, 但社会学在前进中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 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研究质量问题。一是社会调查如何突破一般化描述性框框, 深入改革实际, 对社会动态进行细致、连续、整体性调查, 并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学理论分析; 二是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去论证和阐明改革中出现的和必将出现的社会问题, 并对其进行规律性全方位的探讨。我国当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 从社会学角度看, 主要是对事物的发展缺乏整体、综合、全局性的分析研究。质量问题是综合性指标, 应当从学科建设上全面分析, 整体考虑加以解决。总之, 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的建立,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任重道远。具体地说, 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并妥善解决。

#### 1.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

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 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是同一研究课题或同一研究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任何社会学研究中, 都包括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 经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和检验性, 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充分的材料, 并在理论初步形成后, 用来充实、完善和检验理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则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来认识和预测社会发展规律, 揭示社会机体的整体联系及其规律性。以整体综合为根本目的的理论研究, 为局部分析和调查提供方向、方法。没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指导的经验研究, 很难说是社会学研究。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活的灵魂, 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是决定经验研究能否正确向理论研究前进的桥梁。因此, 理论研究也好, 经验研究也好, 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 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 曾经偏重于经验研究, 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脱节。其表现是, 很多社会调查只限于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一般性描述, 缺乏社会学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分析; 只注重应用、注重历史经验的积淀, 局限于各自的经验范围, 不注意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上去考虑, 不能提升到理论层次去思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则往往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构筑所谓的理论体系, 追求“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社会学在我国恢复以后, 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结合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为了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和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科学地预测社会发展的背景, 在注重经验研究、社会调查逐步深入的同时, 也已开始重视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人员开始走出书斋, 注重联系四化建设的实际, 逐步向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迈进。

#### 2.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研究的着重点是社会有机整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与整体的联系，其立足点则是在辩证综合指导下的对社会机体各细部的详尽深入的局部分析，即微观分析。强调宏观研究，是强调研究的综合性。它要求把视野放开，纵观全局，在分别研究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时始终贯穿整体综合的观点。通过综合的宏观研究，产生统一的、具体的社会整体图景。微观研究可以对局部的社会现象和过程进行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描述、分析，是进行大范围的宏观研究的基础。由于社会学能够冲破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该领域的问题，能从普遍联系中把握特殊现象，有时能比该专门学科对其现象领域中某一问题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能具体入微地分析某一细小的社会现象，解剖社会机体的一个细胞。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的意义在于：在宏观研究时，可以把它分成不同层次、比较微观的领域分别加以研究；在微观研究时，则应站在宏观研究的高度来统帅微观研究。从宏观研究来说，由于它复盖面较广，概括程度较高，能够从现象的整体上去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微观研究则具有在人们的经验上进行测量的描述的特点，可以精细地观察现象的变化过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特点。宏观研究离开了微观研究，就很难准确地描述事物的特征，脱离了宏观研究的微观研究则难于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社会学恢复以来，我们偏重于微观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应用社会学和分支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方面。这些局部的或微观的理论在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时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不能推及到整个宏观领域。3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制度问题解决了，绝不等于其他社会问题都解决了。要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并把具体问题的微观了解同社会问题的宏观研究结合在一起。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要求把社会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来分析。如果我们只注意以分支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的微观研究，只注意个别事物之间的联系，社会学就不能为我们全面的体制改革及有关全局的决策提供建设性的咨询，更不能设计出种种行之有效的抉择方案。社会学必须研究科学决策问题，以便对改革措施的制订和改进提出意见，供党和国家参考。科学研究不是政策的注脚，它应当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社会学必须对有关科学决策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并对解决现实中的诸种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见解和方案来。

### 3.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对事物的具体分析时又可分别去把握，既可以从事物的质的方面，也可以从量的方面，还可以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去分析。定性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对象性质的分析，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纵深的考察，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变化发展的规律。定量研究则是用数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分析，计算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预测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定性研究必须以定量研究为基础，没有一定的量就不可能确定事物的性质。定量研究必须以定性研究为前提，如果对事物的性质都不能把握的话，就无法对该事物进行测量和计算。

在社会学研究中，由于学科刚刚恢复，百废待兴，加上研究经费不足，原有的人类学和哲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以及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多数人员只有单一的非社会学的社会科学知识，定性分析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面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崭新的趋势，如新技术的急剧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出现，理论不能仍然停留在事物的定性描述和解释上。对

事物的分析要求逻辑化、量化、精确化。我国社会学必须从以往偏重于定性分析走向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道路。在前一阶段研究中，定量分析或社会统计分析已在一些分支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应用，但相对整个社会学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 4. 普及与提高

社会学研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因为它和千百万群众的生活血肉相连；它又有显著的实践性，因为千百万群众每时每刻都在实践着社会学提出的课题和结论。这表明，社会学不能只由少数专家、学者来研究，不能只在研究所或是课堂上研究，而要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不断解决社会生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从直接应用中得到发展。社会学重建以来，为了尽快地培养出较多的社会学人才，弥补大学社会学系培养人才之不足，老一辈社会学家把整个社会作为实验室，通过举办各种讲座来普及社会学知识，从1980年起，运用各种短期速成的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教研骨干。随后各地分别根据需要与可能举办了各种专科的进修班，比较集中地讲授一门或两门课程培养专业的师资。这些学员中有一些已成为使社会学这门学科站住了脚跟，较快地打开了局面的骨干。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他们的理论水平虽然有所提高，由于起步晚，原来的基础差，就整体来说，这支社会学队伍的素质还不是很高。而当前社会学的科研项目已由个人（单位）分散研究发展到个人（单位）、地区和国家课题三结合，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协作研究，研究的课题也由单一的社会问题逐步向探索某一社会领域的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因而对科研人员的知识及专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当务之急是加速提高社会学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提高业务骨干的理论水平、多学科知识和现代化调研手段。否则，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很难有什么突破。调研质量问题，归根结底是研究人员的素质问题。我们应当认真、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水平，以便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考察，给予科学的说明和解释，指出解决办法，并进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不仅重视研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也要加强对苏联、东欧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的研究。

#### 5. 建设与服务

社会学既要从整体角度综合研究社会，也要从整体角度综合研究自身的建设和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问题。两者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学应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加速自身的建设，如果只注重服从社会实际需要，忽视社会学自身建设，那么社会学的学科水平将不能很快提高，必然影响社会学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质量。

社会学研究组织应有个合理的布局。任何社会组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个组织不仅与更大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其他组织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更大的组织体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几乎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研究组织的人员配备都不可能覆盖全部内容。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组织，应当是由中央到各省、市许多小型研究组织联结而成的组织体系。面对辽阔的战场，各个研究组织之间应有相对的分工和协作，每个组织的目标都是特殊的、单一的，但是由地位大致相同的组织互相联结，却可以建立起各有所侧重又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的横向关系网，形成社会学的总体布局。只有在横向组织体系中实行积极的、有效的合作，各个组织才能较好地实现自己的社会目标和总体目标。社会学恢复几年来，几乎各省、市都建立了社会学组织，但是纵观全局，无论是



在学科的配套上，还是在队伍的组织上，都缺乏总体规划，各自为战，造成某些领域投入力量过多，研究项目重叠，而在另一些重要分支学科还没有人涉猎、缺门、缺环，不利于全面满足社会实际需要。就一个具体的社会学组织而言，多数也没有构成自己特色的重点研究方向。社会学界这种组织状况，不利于社会学整体效益的发挥，需要从全局出发，加强总体布局，分工协作，形成有机的整体。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科学的社会学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的社会变革，也必然会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正以矫健的步伐，在改革中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

· 人物往来 ·

## 沃尔夫冈·施卢赫特近期 来华访问和讲学

沃尔夫冈·施卢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1938年4月4日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斯堡，1964年毕业于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学系，1967年获自由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72年取得曼海姆大学授课资格，1973年出任杜塞尔多夫大学正教授。施卢赫特曾任德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和联邦德国两家重要的社会学刊物《社会学杂志》与《社会学评论》的共同主编之一，现任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他还是联邦德国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四位委员之一，全集的出版前言出自他笔下。

施卢赫特是当今声望最高的韦伯学家，以治学严谨、见解深刻著称。他在仔细研究韦伯全部著作的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韦伯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西方社会整体的历史进程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施卢赫特对韦伯的理性主义概念做出了独到的解释，提出了“理性主义”的三种用法——科学技术理性主义、形而上伦理理性主义和实践理性主义。他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组织汉学家、印度学家、犹太学家、伊斯兰学家和基督教学家分头讨论了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出版了六本专题论文集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系统的导论。

施卢赫特著述甚丰，主要的有：《对社会法律国家的选择》（1968）、《价值无涉与责任伦理》（1971）、《科层统治面面观》（1972）、《理性透视》（1976）、《马克斯·韦伯的历史视野》（1979，与G·罗斯合著）、《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1979）、《把握世界的理性主义》（1980）、《宗教与生活方式》（1988），有些已译成英、意、日、汉等文字。他将于今年3月来华访问和讲学。

（王容芬）